

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视域下数字时代的交往困境与出路

泽拉卓马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5日

摘要

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导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被物化力量所支配、交往主体被工具化的内在矛盾。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交往的空间结构、媒介形式与互动方式, 在提高交往效率、扩大交往范围的同时, 也催生了主体符号化、关系浅层化、媒介宰制化以及劳动数据化等新型异化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为分析视角, 对数字时代交往异化的形成机制、现实表现与深层原因进行系统阐释, 并从技术伦理构建、制度约束完善、交往主体重塑以及共同体价值回归四个方面, 提出超越异化、回归本真交往的具体可操作实践路径, 同时结合国内外核心研究成果明确本研究创新价值, 推动数字交往从资本主导的虚假联结转向以人为核心的真实交往, 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数字社会的健康运行。

关键词

马克思交往异化, 数字交往, 交往异化, 超越路径

Communication Dilemmas and Solu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Zalazhuoma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May 12,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communication reveal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that human communi-

cation is dominated by reified forces and communicative subjects are instrumentalized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media forms and interaction mod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While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expanding communication scope, it has also given birth to new alienation forms such as subject symbolization, superfici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media domination and datafication of labor.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practical manifestations and deep causes of communicative alien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technological ethics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improvement, communicative subject reshaping and community value regression, it puts forward practical paths to transcend alienation and return to authentic communication, so as to promote digital communication from capital-driven false connection to people-centered real communication, 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sound operation of digital society.

Keywords

Marx's Alienated Communicati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ve Alienation, Transcendence Pa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交往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基本形式，也是个体确证自身社会属性、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实践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穆勒评注》等文本中，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系统阐释了交往异化的基本逻辑[1]。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所特有的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逐渐蜕变为受外部力量控制的被动行为，人与人之间真实、丰富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所遮蔽，交往主体彼此疏离，交往媒介反向支配主体，最终使人的本质力量难以充分实现[1]。

数字技术的普及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生存阶段。社交媒体、即时通信、算法推荐、虚拟空间等新型交往形态，突破了传统物理时空的限制，实现跨地域、跨圈层的广泛连接，大幅提升了交往的便捷性与覆盖面。但与此同时，数字资本、平台算法、技术理性与传统资本逻辑相互叠加，使交往异化呈现出更隐蔽、更普遍、更深入的特征。个体在虚拟互动中易陷入群体性孤独，在符号化表达中遮蔽真实情感，在算法推送中丧失自主选择能力，在日常数据生产中被纳入隐性剥削体系。

当前，数字交往异化已成为影响个体精神状态、社会关系质量与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以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为批判工具，剖析数字时代交往困境的本质与根源，并探索超越异化的现实路径，既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也为破解数字社会治理难题、促进人的数字化解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

2. 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 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是对资本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物化状态的深刻批判，其核心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交往主体异化。人不再是交往的目的，而沦为交往的工具。在资本主导的关系结构中，交往以利益交换为中心展开，个体为满足物质需求开展功利性交往，主体间的平等、尊重与理解被削弱，人

与人呈现对立、疏离与不信任的状态[1]。

第二，交往媒介异化。原本服务于人的媒介形式，如货币、商品等，从手段转变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货币逐渐成为衡量交往价值的唯一标尺，人的情感、道德、尊严被简化为交换价值，人陷入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1]。

第三，交往活动异化。自由自觉的交往实践被迫转向功利化、强制性活动。个体交往不再源于内在情感与社会认同，而是受制于外部规则与利益机制，交往从实现人的本质的方式，异化为维持生存的手段[1]。

第四，交往关系异化。人与人真实具体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抽象关系所掩盖。资本逻辑使社会关系呈现物化与商品化特征，个体难以在交往中确证自身社会本质，最终陷入自我异化与社会分裂[1]。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异化的根本动因在于资本不断追求增殖的内在逻辑，只有扬弃异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实现人的解放，才能重建符合人的本质的真实交往，走向“自由人联合体”[1][2]。

(二) 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的当代意义

尽管数字时代的交往形态发生显著变化，但资本逻辑与物化关系仍深度渗透社会生活，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依然保持强劲的解释力与现实价值。

首先，它为批判数字交往异化提供了稳定的理论框架。数字时代的交往异化本质上是传统交往异化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新形态，资本借助数据、算法、平台等新载体实现对交往活动的隐蔽控制，马克思关于“物支配人”的批判依然具有极强针对性[1]。其次，它有助于揭示数字交往困境的深层根源。数字交往中的孤独化、浅层化、功利化等问题，并非单纯由技术发展造成，而是数字资本、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能够帮助人们跳出技术决定论的片面理解[3]。最后，它为超越交往异化指明价值方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重建以人为核心的交往关系，规范资本与技术的运用，推动数字交往回归人文性与真实性，为数字社会治理提供根本遵循[1]。

3.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一)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界围绕数字劳动、媒介异化、平台治理等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脉络。首先，在数字劳动与剥削研究领域，Srnicek & Williams (2015)提出平台资本主义理论，指出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提取、无偿占有用户劳动实现资本持续增殖，数字交往在本质上成为数据生产的过程[4]。Fuchs (2017)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将社交媒体用户的浏览、互动、分享等行为界定为无偿数字劳动，系统揭示平台对用户的隐性剥削机制，成为数字劳动研究的标志性成果[5]；其次，在交往异化与媒介权力研究领域，Couldry & Mejias (2019)提出“数据殖民主义”概念，认为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抽取与交往控制形成新型支配关系，与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形成跨时空呼应[6]。Van Dijck (2013)指出，算法与数据重构了交往规则，媒介从工具转变为权力主体，引发交往关系浅层化与主体自主性衰退[7]；最后，在平台治理与技术伦理研究领域，Zuboff (2019)提出监控资本主义理论，揭示数字资本通过监控交往行为、提取个人数据实现牟利，是数字交往异化的重要成因[8]。Pasquale (2015)聚焦算法黑箱问题，提出算法审计、数据透明是破解媒介宰制、恢复主体自主性的关键路径[9]。

(二)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研究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聚焦数字交往异化的本土表征与治理路径。韩哲(2025)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读西方数字交往危机，强调资本逻辑是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3]。张成岗、王明玉(2025)分析数字交往中的自我异化问题，提出主体觉醒与技术规制相结合的治理思路[10]。刘英杰、姚杨(2025)结合新质生产力背景，探讨数字交往的良性发展方向，强调技术普惠与人本回归[11]。郭洪水(2025)梳理数字

交往异化的具体形态,提出技术约束、伦理规范、主体培育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案[12]。蓝江(2018)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为数字交往异化的理论阐释提供重要支撑[13]。

(三) 本研究的创新点

第一,现有研究多分散讨论数字劳动或平台治理,本文以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为统一框架,整合主体、媒介、关系、劳动四重异化,形成系统性分析体系。第二,国内研究对策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将对策细化为可操作、可评估、可落地的具体路径,明确实施细则、可行性与潜在挑战。第三,打通国内外研究对话壁垒,结合西方平台资本主义、数据殖民主义理论与本土治理实践,凸显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在数字时代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

4. 数字时代交往异化的现实表现与形成机制

(一) 数字交往异化的主要表征

第一,交往主体符号化与碎片化。在数字交往中,个体以头像、昵称、表情包、标签等符号形式在场,真实完整的主体被拆解为碎片化数字形象。为迎合平台规则与他人评价,个体常刻意塑造理想化人设,真实情感与个性被遮蔽。算法推荐进一步固化信息茧房,使个体认知与交往圈持续收窄,主体性不断弱化[13]。

第二,交往媒介宰制化与拜物教化。数字平台、算法、数据从交往工具转变为支配交往的权力力量。平台通过规则与用户协议垄断交往渠道,算法依据流量与利益偏好筛选内容,数据成为衡量交往价值的新尺度。点赞量、粉丝量、转发量等数据指标成为个体追逐的目标,数字媒介拜物教成为控制人的新形式[11]。

第三,交往关系浅层化与孤独化。数字交往呈现高频次、浅层次、弱连接特征。点赞、评论、刷屏等行为看似实现广泛联结,却缺少深度情感交流与精神共鸣。个体线上好友数量庞大,线下却陷入孤独,面对面交往能力持续退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责任被虚拟化表达削弱,社会关系呈现流动化、碎片化状态[13]。

第四,交往劳动无偿化与剥削化。在数字经济中,个体的浏览、互动、分享等交往行为同时构成数字劳动。用户在交往中持续生产数据,这些数据被平台无偿占有并转化为商业利润,形成隐蔽的数字剥削。个体在无意识中成为数字资本的价值生产者,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高度融合[5]。

(二) 数字交往异化的形成逻辑

数字交往异化是技术逻辑、资本逻辑与社会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技术逻辑推动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数字技术以效率、精准、标准化为导向,工具理性不断挤压价值理性空间,忽视人的情感需求与主体性。算法将复杂交往简化为数据处理,技术自主性不断增强,为交往异化提供技术条件[7]。

其二,资本逻辑驱动数字资本无序扩张。数字资本以持续增殖为目标,通过平台垄断、流量变现、数据商品化等方式,将数字交往纳入资本增殖体系。资本逻辑渗透交往全过程,使交往从为人服务转向为资本服务,成为异化的根本动力[4]。

其三,社会逻辑加剧现代性困境与主体能力不足。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功利化趋势使个体处于原子化状态,缺乏稳定社会联结;数字素养不足使个体难以识别技术与资本的隐性支配;伦理规范滞后无法有效约束数字交往失序行为,进一步加剧异化[3]。

5. 数字交往困境的深层根源

(一) 数字资本支配:经济根源

马克思指出，资本增殖逻辑是交往异化的根源[1]。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成为新的支配力量，通过数据垄断、平台霸权、数字剥削等方式，将人与人的交往转化为数据生产与资本积累的过程。交往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方式，而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最终导致交往功利化、浅层化与全面异化[12]。

(二) 技术理性泛滥：技术根源

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不断膨胀，挤压价值理性空间。技术设计以效率和利益为中心，忽视人的情感、尊严与精神需求；算法黑箱形成技术权力，规训个体行为；个体对数字媒介过度依赖，逐渐丧失自主性，人从技术的主人变为技术的附庸[9]。

(三) 主体性衰退：主体根源

在数字资本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压力下，个体主体性持续弱化：盲目迎合算法，缺乏批判意识；将虚拟符号等同于真实自我，引发认同危机；沉迷虚拟交往，忽视现实关系。主体性缺失使个体难以抵抗异化力量，成为交往异化的被动承受者[9]。

6. 超越数字交往异化的可操作路径

(一) 重塑技术伦理：推动数字技术回归人本

算法人文设计：在算法目标中嵌入情感关怀、隐私保护、多元包容等权重，禁止算法诱导过度使用与沉迷；建立跨学科算法伦理审查机制，对算法上线与迭代开展前置评估。该路径技术可行，但需平衡商业流量与人本目标。

算法透明与监督：推行算法公开清单，明确推荐逻辑与数据使用范围；建立第三方算法审计制度，定期公布审计结果；为用户提供算法关闭与申诉渠道。国际已有成熟经验，但需协调商业机密与公共透明的矛盾。

线上线下交往融合：平台设置线下交往激励模块，限制单一虚拟互动时长，推送真实场景社交机会；开发虚实结合交往产品，强化真实情感联结。该路径成本低、接受度高，但需要政策引导平台转型。

(二) 完善制度规制：约束数字资本无序扩张

数据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明确用户数据的人格权归属与财产权共享机制；平台使用交往数据须获得明确授权；建立数据收益分成制度，保障用户合理分享数据变现价值。该路径法律可落地，但数据核算难度大、平台阻力较强。

算法审计实施细则：制定包含公平性、透明性、非剥削性在内的审计标准；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不合格平台限期整改，暂停相关功能。监管体系可逐步建立，但面临技术门槛高、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

平台反垄断量化指标：设定市场份额、用户覆盖率、数据垄断度等可量化指标；禁止“二选一”、流量歧视、封禁外链等行为；对超大型平台实施重点监管与业务拆分。该路径有国内外实践支撑，但平台跨界经营使监管边界模糊。

数字劳动权益保障：将用户数据生产纳入劳动保护范畴，明确平台补偿义务；设定数字劳动时长上限，禁止强制隐性劳动；打击流量造假、数据贩卖等行为。法律可补充相关条款，但数字劳动边界与计量方式仍存在争议。

(三) 培育主体自觉：提升数字交往自主性

分层数字素养教育：在中小学开设数字伦理课程，高校开展数字化批判教育，社会面向成人与老年群体提供普及培训。教育体系可快速融入，但需持续更新内容以适配技术发展。

真实交往能力培育：引导个体减少符号化表演，鼓励真实表达；推广无滤镜、无人设的交往模式；强化面对面交往训练，提升线下互动能力。个体可自主实践，但虚拟社交习惯固化带来转型阻力。

批判意识与自主选择：普及算法逻辑与资本运作知识，提升识别能力；鼓励主动打破信息茧房，拓

展多元交往圈；倡导理性使用媒介，避免过度依赖。科普与引导可实现成效，但算法诱导对个体自制力构成持续挑战。

(四) 重建交往共同体：回归人的社会本质

人本数字共同体建设：打造平等、包容、互助的数字交往空间；打破圈层壁垒，促进跨群体交流；建立以共同体价值为导向的交往规则，弱化功利化与流量化导向。技术可实现，但资本平台缺乏自发转型动力。

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技术普惠，降低设备与网络成本；为弱势群体提供数字技能帮扶；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均等化。政策可强力推进，但区域与群体差异使普惠成本较高。

构建人本交往生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设计交往场景与平台功能；弘扬真诚、平等、尊重的交往理念；培育非功利、重情感的交往文化。理念可广泛普及，但受资本逻辑深度渗透影响，转型周期较长。

7. 结论

数字技术改变了交往的外在形式，却没有消除资本逻辑下交往异化的内在本质。数字时代交往困境是资本逻辑、技术理性与主体性缺失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中表现为主体符号化、媒介宰制化、关系浅层化与劳动剥削化，其核心在于数字资本对人的支配与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为理解和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1]。超越数字交往异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技术伦理建构、制度规则完善、交往主体重塑与共同体价值回归，推动数字交往从资本主导的虚假联结转向以人为目的的真实交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也是实现人的数字化解放、建设健康数字文明的必然要求。

在数字社会快速演进的今天，只有始终坚守人的价值，规范技术与资本运行，重建真诚、平等、深度的交往关系，才能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合理、更文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 韩哲. 西方社会数字交往危机的政治经济学阐释——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资本主义考察[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5): 115-122+130+159-160.
- [4] Srnicek, N. and Williams, A. (2015)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 [5] Fuchs, C. (2017)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 [6] Couldry, N. and Mejias, U.A. (2018)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 336-349. <https://doi.org/10.1177/1527476418796632>
- [7]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licAffairs.
- [9] Pasquale, F. (2015)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4159/harvard.9780674736061>
- [10] 张成岗, 王玉. 数字交往中的自我异化及其治理逻辑构建[J]. 治理研究, 2025, 41(3): 102-112+2+159-160.
- [11] 刘英杰, 姚杨.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发展研究[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3(4): 105-114.
- [12] 郭洪水, 张淑华. 数字交往形式的异化及其应对[J]. 科学·经济·社会, 2025, 43(2): 23-33+2.
- [13] 蓝江.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 哲学研究, 2018(3): 26-33+128.